



西汉金竹节熏炉
公主远嫁图



一、罪人成“公主”

出玉门关一路往西,满目黄沙,直接天际。从这里一直到葱岭的整片地区,就是古人所谓的西域。在汉武帝之前,西域与华夏互不相知。公元前138年、前119年,张骞两次通西域,才逐渐打通这条道路,使得汉朝和西域诸国有有了初步交往。《汉书·西域传》说:“西域以孝武时始通,本三十六国,其后稍分至五十余。皆在匈奴之西,乌孙之南。”可见分布在这片区域中的族群有多复杂,大大小小三五十个部族和王国,有些接近匈奴,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,有些则更像汉人,在城郭中定居,也从事农业耕种。甚至还有些生活在崇山峻岭中、文明程度比较落后的族群。其中既有人口几十万的大国,也有只有几千人、乃至千把人的小族群,风俗迥异,语言不通。这条后来以“丝绸之路”闻名于世的道路,对于征途初开的汉武帝时代来说,更让走在其间的人们倍感艰辛。路上会碰到些什么?怎么应付那些语言、习俗迥异的异族人?路上断根断水了怎么办?都没有现成的答案,而且还时时遭遇匈奴人的威胁。张骞第一次出使,历经十三年,其中将近十一年时间,被匈奴人扣押,带去的百余名随从,最后也只跟回来一个。汉武帝派往西域的使团和军旅,往往会因为饥渴在路上死亡一大半。

公元前105年,一个由汉朝政府派出的使团又出现在这条道路上。出使目的地是地处西北端的乌孙国,任务是护送一位和亲“公主”。张骞第二次出使前,游说汉武帝与乌孙结盟,可以在战略上起到斩断匈奴右臂的作用。为确保盟约缔结,张骞还建议汉武帝嫁一个公主到乌孙。乌孙国最初并没有答应汉朝的结盟提议,后来遭受匈奴攻击,想起了汉朝的结盟许诺,又主动遣使求尚公主。乌孙的出尔反尔自然使汉朝君臣反感。但当时的汉朝,因与匈奴连年征战,战马吃紧。乌孙出产的马匹质量远远高于汉地本产,曾被汉武帝誉为“天马”。于是汉武帝和他的大臣们趁机向乌孙王索取良马作为聘礼。当乌孙国进献的一千匹良马到达长安后,汉武帝履行了嫁出公主的诺言。

据《汉书·西域传》记载,乌孙国首都赤谷城,距离长安八千九百里。古人重乡土,谁家愿意让闺女奔波万里,远嫁异国,在一个言语不通、风俗不合,举目皆是异类的城邦中生活一辈子?当时的乌孙王八十多岁,老迈昏聩,哪个姑娘又愿意和这么个糟老头子厮守?即便是普通百姓家的女儿,也不会愿意,更何况是金枝玉叶、皇家脉裔。但这位走在通往乌孙之路上的“公主”没有选择,因为她是罪人。“公主”名叫刘细君,并不是汉武帝的姐妹或女儿。刘细君的父亲是江都王刘建。刘建因荒淫无耻、暴虐杀亲而臭名昭著,公元前121年涉嫌谋反而自杀。刘建自杀的时候,刘细君尚年幼,身为反贼之女,从此也被深深地打上了“罪人”的烙印。由于史料的缺乏,我们不知道远嫁乌孙那年,刘细君的确

切年龄,也不知道她在此之前是否有过婚姻生活。当乌孙的聘礼到达长安时,看来汉武帝并不舍得用自己的亲生女儿去换这一千匹战马。此前为朝廷所不齿的罪人之女刘细君,被想起来了。汉武帝赐与刘细君“公主”封号,君恩浩荡,无尚荣光。随后汉武帝又命她为国家大计,远嫁乌孙,即便是横渡流沙,去国万里,刘细君又有什么能力反抗呢?

“吾家嫁我今一方,远托异国今乌孙王,穹庐为室兮旃为墙,以肉为食兮酪为浆,居常土思兮心内伤,愿为黄鹄兮归故乡。”这首著名的思乡曲,即出自刘细君手笔,只要能回故乡,哪怕是化身黄鹄。据说这首思乡曲传回长安,也换回了汉武帝的几分悲悯,隔三岔五派遣使者带着汉朝的帷帐锦绣,颁赐刘细君。

刘细君远嫁乌孙所遭受的磨难,远远不止这些。刘细君到了乌孙后,治宫室别居,和言语不通、年老昏迈的乌孙王,一年见不了几次面,没有真正的婚姻生活。更糟的是,按当地风俗,新乌孙王可以继承老王留下的妻妾。所以老乌孙王在指定他的孙子为继承人的同时,也要求刘细君必须嫁给这个孙子。这严重违背汉人的伦理观念。汉武帝派人带话给刘细君:“从其国俗,欲与乌孙共灭胡。”(《汉书·西域传》)为联合乌孙消灭匈奴,汉武帝要刘细君忍下这些委屈。新乌孙王如愿以偿地得到了刘细君,并育有一女。刘细君却在乌孙生活了四年之后,郁郁而终。为了继续保持和乌孙的同盟关系,太初四年(公元前101年),汉武帝又嫁了一位“公主”到乌孙。

这位“公主”叫刘解忧。无独有偶,她和刘细君一样,都是罪臣亲属。刘解忧的祖父楚王刘戊,不仅和刘细君的父亲刘建一样暴虐荒淫,而且曾参与汉景帝时期著名的“七国之乱”,后因兵败自杀。作为国家的“罪人”,刘解忧同样获得了一次为国效力的机会。汉武帝把她封为公主,让她到乌孙国替代郁郁而终的刘细君。

刘解忧有很多遭遇,与刘细君相同。比如她也曾被继任的乌孙王强娶,生育了一个男孩。但她有一点比刘细君幸运,虽然经历了很多磨难,刘解忧还是活到了七十多岁。上书给汉朝皇帝,年老思故乡,愿归葬汉地。皇帝答应了刘解忧的请求,将她接回长安。其时已经是汉宣帝甘露三年(公元前51年),刘解忧在乌孙整整生活了半个世纪。少年出嫁,白首归来,日夜思念的故国,早已人物两非,其悲何如?

二、张骞的自私

刘细君和刘解忧的悲剧命运,都拜一人所赐,那就是以开通西域第一人而名垂青史的张骞。张骞第一次出使回来后,凭借着在匈奴生活了十余年的经验,在汉匈战争中,帮助汉朝军队寻找水草和把握方向,建立了功勋,汉武帝因此封张骞为“博望侯”。但短短两年之后,张骞和李广分别率军出击匈奴。李广的军队被匈奴围困了,而张骞没有及时前来会合,导致李广所部损失惨重。因为这个过失,张骞本来要被问

远嫁的罪人

——汉武帝时代两位和亲西域的「公主」

◆ 姜鹏



斩,他出钱赎罪,留得活命,但博望侯这个爵位被削夺了。

十年囚徒生涯,几番命悬一线才换回来的侯爵,就这么没了。功名富贵真也是别时容易见时难。张骞岂能甘心!他打算利用汉武帝对异域的好奇,争取第二次出使,重新博得封侯的机会。前一次出使,游说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未果,这一次,张骞决定还是以匈奴为借口说服汉武帝。张骞为汉武帝提供了另一个潜在盟友:乌孙国。根据张骞的介绍,乌孙和月氏、匈奴之间都有恩怨过节,乌孙老首领曾经被月氏人攻杀,后来新一代乌孙王打败了月氏,迫使月氏人往西迁徙。在乌孙人往西追击月氏的过程中,匈奴人就趁机控制了东边原来属于乌孙的地盘。张骞对汉武帝说:“蛮夷恋故地,又贪汉物。诚以此时厚赂乌孙,招以东居故地。汉遣公主为夫人,结昆弟,其势宜听。则是断匈奴右臂也。”(《汉书·张骞传》)战略目标是要和乌孙结盟,斩断匈奴的右臂。达到目标的手段,不仅要用财物拉拢,还要嫁公主、结婚姻。至于通过这些手段,是否能达到预期目标,张骞则云“其势宜听”,换成今天的话说,就是“应该是可以的”。

为增加成功获得出使机会的把握,这次游说,除匈奴问题这个借口外,张骞还另外增加了一项砝码。他又对汉武帝说:“既连乌孙,自其西大夏之属,皆可招来而为外臣。”(《汉书·张骞传》)可以让乌孙、大夏这些西域诸国成为大汉的“外臣”,也就是藩属国,以此达到“广地万里,重九译,致殊俗,威德遍于四海”的目的。每年都有大量操着不同语言、有着不同生活习俗的异族人朝见,能让皇帝的威德遍于四海。就当时情景而言,匈奴问题虽未彻底解决,但在连年征战中,汉朝已经获得了初步成功,继续寻找西域盟友的策略可以一试,汉武帝更为好奇的,是新鲜、陌生,充满刺激的西域本身。如果能让西域成为大汉的藩属,意义决不下于打垮匈奴。于是听完张骞这番话,“天子欣然以寡言为然”,飘飘然做起世界领袖的美梦来。

张骞成功地挑动了汉武帝的虚荣心,也成功地获得了第二次出使的机会。为了实现这“应该”能达成的战略目标,刘细君和刘解忧都成了目标实施过程中的棋子,命运就这样被确实实地改变了。《汉书·

西域传》说乌孙国“随畜逐水草,与匈奴同俗……故服匈奴”,乌孙不仅和匈奴地域接近,也是和匈奴一样的游牧民族,而且有很长的屈服于匈奴的历史。单靠远嫁一名公主,汉朝是否就能成功笼络住这位千里之外的“盟友”,是一件很可疑的事情。当刘细君嫁到乌孙后,匈奴人听到这个消息,也送了一名女子到乌孙。乌孙王立刘细君为右夫人,立匈奴女子为左夫人。从风俗与后援距离的角度看,刘细君的竞争劣势,不言而喻。而在匈奴的威慑下,乌孙王又岂敢得罪匈奴,专事汉朝。所以,即便撇开两位和亲“公主”的个人命运沉浮不谈,用这样的方式来寻求政治突破,其效可验。后来的事实证明,这个策略不仅凭空毁了两位和亲“公主”的一生,也给汉朝政府带来了许多麻烦,结盟西域、共击匈奴,在汉武帝时代从未奏效过,相关影响却波及昭帝、宣帝时代。

昭帝时,匈奴曾联合车师,入侵乌孙。刘解忧上书汉廷,要求发兵相助。廷议许以出兵,后因昭帝崩逝而取消了该项行动。到宣帝时期,因乌孙而引发的汉匈战争,还是爆发了。就在汉宣帝继位不久的本始三年(BC.71),匈奴派遣使者至乌孙,敦促乌孙人将刘解忧押解至匈奴,试图通过这个方法切断乌孙和汉朝的联系。这也是匈奴用最直接的方式,对汉朝和乌孙通过婚姻缔结盟约表达不满。汉廷得到刘解忧的奏报后,汉宣帝发动十五万骑兵,五道并发,支援乌孙,共击匈奴。这次协同作战,大破匈奴,获得了不小的战绩。元康二年(BC.64),乌孙王再次向汉廷提出了姻盟请求,愿以良马千匹为聘礼,让自己的儿子尚娶汉公主。乌孙王在呈奏中特别指出,自己的这个儿子是“汉外孙”,冀希以此打动汉廷。在收到乌孙的聘礼后,汉宣帝决定以刘解忧的侄女刘相夫为公主,继续这桩政治婚姻,并事先安排刘相夫学习乌孙语。当护送刘相夫的队伍到达敦煌的时候,得到了乌孙内乱的消息。乌孙王死,他和刘解忧的儿子,也就是向汉廷求亲的“汉外孙”,没能顺利继承王位。汉廷内部讨论是否要继续护送刘相夫到乌孙,完成婚姻诺言。大臣萧望之说,此前汉朝嫁公主到乌孙,已经四十余年,这四十余年除了不断给汉朝带来麻烦外,没有起到任何作用。再嫁公主,以后乌孙若有麻烦,汉朝于情于理,又都不能坐视不理。因此,萧望之建议汉宣帝,趁此机会停止与乌孙的和亲。汉宣帝采纳了萧望之的建议,将刘相夫召回。

刘相夫算是躲过一劫,没有走上刘细君和刘解忧的老路。但已然卷入乌孙国政治漩涡的刘解忧,却将因此而遭受更大的不幸。乌孙贵族共同策立的新任乌孙王,因行事狂悖而被称为“狂王”。正是这位“狂王”,在听说汉宣帝半路召回刘相夫之后,强娶了刘解忧。刘解忧不仅饱受“狂王”羞辱,并被迫为他生育一子。刘相夫被召回后,汉朝虽再未派遣过和亲乌孙的公主,但由于这段特殊的历史,乌孙一旦

遭到内忧外困,便会牵动汉朝的神经,给汉朝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。班固在《汉书·西域传》中,用这么一句话点评汉朝和乌孙国之间的关系:“汉用忧劳,且无宁岁”。

当初张骞的一个私念,不仅改变了刘细君、刘解忧的人生轨迹,也通过涉外战争等形式影响到了生活在汉帝国内部的每一个人。当然,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,刘细君和刘解忧借这个机会挣脱了罪人子孙的身份,而变身为肩负国家使命的“公主”。幸与不幸,难以评说。

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,张骞通使封侯,成为一个榜样,展示着它无穷的力量。《汉书·张骞传》“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,其吏士争上书,言外国奇怪利害,求使。”不管是不是真知道域外情况,都争着给汉武帝上书,希望获得出使的机会。根据司马迁的现场观察,这些人往往都是“妄言无行之徒”。出使毕竟是苦差事,之所以有这么多人愿意走上这条路,是因为这里有巨大的利益回报。除了名之外,更重要的是利。汉武帝每次派遣使者,都会让他们带很多钱币、货物去颁赐夷蛮,夸耀富豪。这些出使的人“皆私县官赍物,欲贱市以私其利。”(《汉书·张骞传》)很多使者拿到汉武帝给他们送往域外的货物之后,就合计把这些东西给贱卖了,变成自己腰包里的现钱。于是张骞的一己私念,又成就了这无数私念。

但悖论在于,从宏观历史的角度看,这些给生活在当时的很多个体、群体造成伤害的行为,却也推动着历史的发展。认知的扩大、文明的交流、物种的传播,乃至我们今天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,无不借助着轰轰烈烈的西使运动得以实现。在这幅绚丽富丽的历史画卷中,刘细君和刘解忧的个人命运,显得如此卑微。是该更重视个体价值,还是该更重视人类文明整体成绩的取得,这个话题可以无休无止地争论下去。若今人果真能穿越过去,把宏观历史框架下通使西域的正面意义告知刘细君和刘解忧,她们又会作何想?



▲ 汉武帝时期河西竹简



▲ 敦煌壁画《张骞出使西域》